



谁发现了文明丛书

龙出辽河源

郭大顺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l
o
n
g
c
h
u
l
i
a
o
h
e
y
u
a
n

郭大顺 著

龙出过河源

百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龙出辽河源/郭大顺著.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1

ISBN 7-5306-3209-4

I. 龙… II. 郭… III. 文化史 - 研究 - 辽河流域
IV. K2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60395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张自忠路 189 号

邮编:300020

e-mail: 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022)27312757 邮购部电话:(022)271167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天津市桃园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9.25 插页 2 字数 207 千字

2001 年 9 月第 1 版 200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4000 册

定价:16.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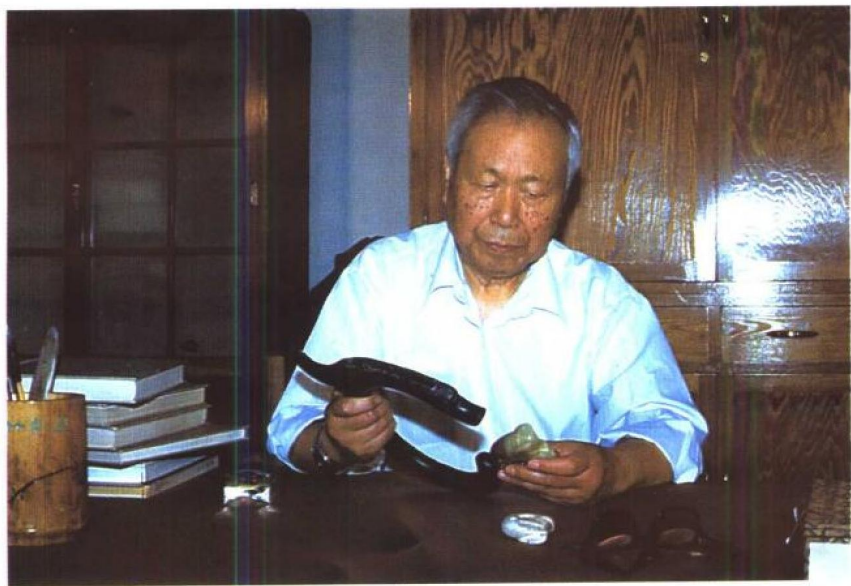


金牛山人骨出土情况。



位于查海聚落址中心的巨型“龙形堆石”是迄今最早的龙形象。

牛河梁遗址出土红山文化女神头像——“她是红山人的女祖，也就是中华民族的共祖”。



苏秉琦教授创建的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和古文化古城古国理论，将中国考古学推进到一个新阶段，并提出辽河文明曾先走一步。这是他在研究红山文化玉器。



牛河梁遗址第二地点冢1第
4号墓出土红山文化玉雕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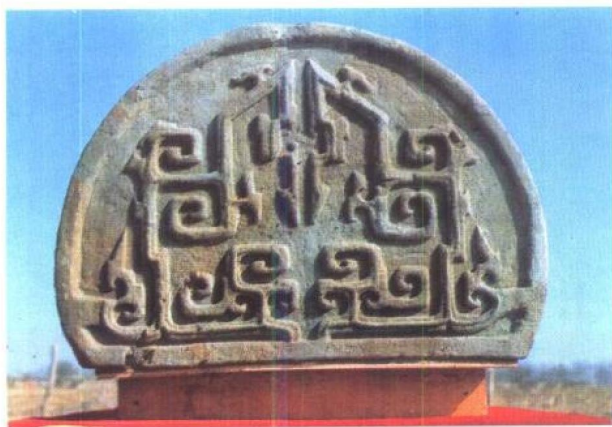


大甸子出土夏家店
下层文化彩绘饕餮纹陶
鬲是先商文化典型器。



马厂沟出土燕侯孟表明周初封燕伊始势力就已达辽西地区。

耸立于山岗的盖县二台子大石棚，作为国内现存最大的山石遗迹，是当地民族进入古国时代的实证。



姜女石秦宫遗址出土夔纹巨型瓦当只见于秦始皇陵。



丛书总序

1869 年的一天，夜色降临在希腊西部一个叫伊萨卡（Ithaca）的小岛上。一片乡村空地上聚集着一群村民。人群的中心坐着一个衣着阔绰的外国人，正抑扬顿挫地朗诵着伟大的荷马的六步韵诗。

那是《奥德赛》第二十三章：

她这样说，激起奥德修斯无限伤感，
他搂住自己忠心的妻子，泪流不止。

有如海上漂游人望见渴求的陆地，
波塞冬把他们的坚固船只击碎海里，
被强烈的风暴和险恶的巨浪猛烈冲击，
只有很少漂游人逃脱灰色的大海，
游向陆地，浑身饱浸咸涩的海水，
兴奋地终于登上陆岸，逃脱了毁灭；
佩涅洛佩看见丈夫，也这样欢欣，
白净的双手从未离开丈夫的脖颈……

夜风吹来，海浪的鼓荡就在耳边，夹杂着似乎是兵戈的铿锵和战士的呼号。朗诵者流泪了，村民也跟着哭泣起来。

这或许不是考古史上最激动人心的一刻，但却是最为动人的一幕。

伊萨卡是英雄奥德修斯的出生地，那些村民是《荷马史诗》中死去三千年的人们的后代；而那个古怪的外国人叫亨利－谢里曼(Heinrich Schliemann)，在那一刻之前，他是百万富翁，在那一刻之后，他是最了不起的业余考古学家，考古史上最富传奇性的人物。

出于童年时代就产生的对《荷马史诗》所讲述的那些故事的迷恋和热爱，还带着一股子倔强和对古人的笃信，他发誓要找到传说中的特洛伊城。为此他拼命积聚财产，并先后学习了英语、法语、荷兰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意大利语、俄语、瑞典语，以便为将来的发掘奠定基础。他可能是那个世纪最非凡的语言天才，每一种语言只用了一个半月的时间就达到能流利地说和写的程度。他把希腊语放在最后，据说是害怕一学起来就入了迷，而在财力不足以支撑事业的时候就放弃经商。最后，使这个童话更像童话的是，他娶了

一位美得像海伦一样的希腊姑娘为妻。

他在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放弃了经商，到希腊寻找他的梦想。

在谢里曼的时代，人们把《荷马史诗》当作神话和文学作品而不是历史来阅读。那场惨烈的战争，所有的剑与火，哀痛和呻吟，被看做关于古希腊世界悲剧美的一个隐喻；诗中描述的雄伟的城池和令人难以置信的财富，也被认为通通是古人的想象。谢里曼不相信这些。他单枪匹马地向历史学家、语言学家和一切怀疑论者挑战。靠着铁锹和锄头以及似乎是神谕的指引，他找到了特洛伊城，后来又找到了以黄金著称的迈锡尼。谢里曼向世人证明，荷马笔下的希腊不只是诗中的神话，在有史料可查的历史时期之前，这片蔚蓝的海域就已经有了高度发展的文化。

谢里曼对考古学做出了了不起的贡献。是他“把考古学从学者的油灯下解放出来，放在古希腊天空的阳光下”。考古学自此“从古典文字的局限中迈出了一大步，进入了远古的实际生活”。这是一场革命。

谢里曼的故事在考古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也传诵得最广。他以后，这种故事就再也没有出现过。尽管亚瑟-伊文斯(Arthur John Evans)发掘了克里特，霍华德-卡特(Howard Carter)找到了吐坦卡蒙的陵寝等等，都蔚为壮观，尽管也有业余考古学家做出了出色的贡献，但他们大多是严谨的学者，身上缺乏谢里曼那种浪漫的骑士精神。随着谢里曼时代的过去，考古学开创阶段宣告结束，这门学问日益成为按照严格的方法循序渐进的文化研究活动，它本身的魅力却也随着猎奇活动的消失，在一般人的心目中日渐减少。

现代考古学越来越成为精密的科学，越来越强调方法

和技术。一个考古学者的研究领域可能并不大,但却要与文献学、古文字学、历史学而且现在还要与真正的自然科学的方法发生密切的关系。有的时候会出现这种情况,即最宏伟全面的理论与对一个微小而精细的专业问题的长篇大论的分析纠缠在一起。对考古学有些兴趣的人或许在反复读过几遍以后,对问题所在及其所耗费的精力表示理解,但说真的,很少有人会去读完它。

令人难以理解的还有,就是一位考古学家如何能够兴趣狭窄到一辈子只研究一两样东西,而且看起来往往收获很少。

再就是他们的书,大多不忍卒读!

此外,本来最令人激动的发掘本身,变得比原来更细致刻苦,但也缓慢得多了。每一地层都被细致地铲起,粉碎,或者刷去,每样东西都要过筛,这样才不会遗漏可能来自大地的任何一点信息。例如,在西班牙的阿普尔卡的“遗骨之穴”,发掘者每一年的七月只移去大约十英寸的泥土。与此相比,谢里曼早期的方法——一掘到底——比盗墓贼强不了多少。但这种精致却让门外汉们难以忍受,他们宁可怀念谢里曼那个铁锹和锄头飞舞的时代。

现代人尽管尊重考古学家和他们的工作,但在感情上倾向于把他们看成是有点怪癖的人。

那么,考古学离我们究竟有多远呢?

人类似乎总是对古代遗迹感到好奇。收集文物的癖好出现得很早。例如,公元前6世纪的一位色雷斯公主对石器时代的石斧有特殊的兴趣,人们在她的陵墓中就发现有这样一份收藏。在北美,公元前6、5世纪易洛魁人的遗址中也有几千年前的人造器物。而在南美,印加帝国的皇帝喜欢收

集若干世纪前绘有色情图案的陶器。古巴比伦国王纳布尼都斯在公元前 6 世纪发掘了一座数千年前的庙宇，他是已知最早的“考古学家”。凯撒的战士在意大利和希腊建立殖民地时，曾发现了许多伟大的古迹，他们从坟墓中劫掠陶器和青铜器，在罗马卖到了很好的价钱。奥古斯都大帝则收集“已经灭绝的海洋与陆地怪兽的巨大遗骨”和“古代英雄们的武器”。

中世纪的欧洲人将从地下偶尔挖出来的燧石、陶器和石斧收藏在橱柜里，与动物化石和不知道是什么的千奇百怪的东西陈列在一起。而这时候，艺术家们从新发现的古希腊和罗马雕像身上获取了灵感，纷纷开始研究古典的形式。富有的家庭则开始收集和展出古典文物，作为有教养和时髦的象征。

到了 16 世纪，学者们开始陆续去走访驰名已久的遗迹，搜寻远古的信息，这些活动留下了大量优美而富于激情的描述。它变成一种更为系统的兴趣是在 17 世纪和 18 世纪，发掘工作日益增多并有一些方法作为经验积累下来。考古学取代古物研究而盛行起来是 19 世纪中叶早期的事，这时人们渴望更系统、更科学地了解过去的遗存。正是在这一时期，发现了石器工具与已灭绝动物之间的联系，人类的远古状况被首次证实。接下来也就是谢里曼那个时候，考古学真正成为一门兴旺的事业。那时，许多同样伟大的考古学家——比特里（Petrie）、考尔德威（Koldewey）、彼得-瑞弗斯（Pitt-Rivers）等等，在世界各地勤奋地工作，许多伟大的遗迹被发掘出来或得到清理。从这时候起，科学方法取得了胜利，认识也获得进步，考古不再是对宝藏的追寻，而是对信息的探求和分析。

这种对过去的源远流长的好奇心——现代考古学不能说已经摆脱了这种看似浅薄的东西，它依然是科学研究的动力之一——是成年或自命成熟的人类对自己童年的兴趣吗？他们总是想找到自己的出生地，比儿童更渴望知道自己是从哪里来，或许也想知道自己将往何处去。抑或这只是一种怀旧情绪，或者，一种进化论的快感？

现在回忆一下，我们在参观博物馆或遗址时是怎样一种心情呢？我们渴望某种细节，从中获得感动，换言之，一种把我们和古人相联系的方法。

相比较而言，人们对古人的精神生活，他们如何信仰，如何思考，如何相爱，如何彼此仇恨，比对他们是如何制造出来那些简陋或豪华的器物更感兴趣。吐坦卡蒙的金棺用多少黄金又加上多少宝石镶嵌花费多少人工，解说员对此的描述常常引来阵阵咋舌，但当说到年轻法老的枕边曾有一只他妻子献上的朴素的小花环——尽管此时花环已经不在——却可以使我们从心底发出深深的叹息。霍华德-卡特自己曾这样描述他看见这只小花环时的感受：“尽管这里一片金光闪闪，举目尽是皇家的豪华，但什么也没有这几朵枯萎的花美丽。花虽枯萎，却还能辨出颜色。这些花告诉我们，三千三百年不过是从昨天到今天这样短暂的一瞬。这些花使我们感到了大自然，感到埃及古代文化和我们的现代文化是一回事。”1925年冬他再次进入陵寝：“这时我对这座陵寝已很熟悉，但这决不能消除它的神秘气氛；我总感到墓中有一种看不见的力量聚集不散。考古学家从事开拓时尽管沉浸在具体的工作中，但可以清楚地感到过去和现在的统一。”

考古学对于人们来说也是这样，如果只是罗列各种珍贵文物，虽然一再赞扬它们的价值，也并不能使人们有更多的理解和共鸣。是的，这是一柄石斧，但这与我有什么关系呢？只有让他感觉自己似乎是石斧的主人，他偶尔用它来杀人但更多的是用来狩猎和砍伐，他才会感到兴趣。

这里马上就涉及到考古学家写的那些著作了。据我们所知，不少考古学家都试图在通俗读物方面进行尝试，向门外人介绍自己的工作，向世人证明考古学的价值所在——它并不像人们通常理解的是一门“奢侈的学问”。有些成功的例子，但大多数都失败。卷帙浩繁的考古学巨著常常被放在书架最显眼但不常有人光顾的地方，尽可以想象，覆盖着灰尘并结满蛛网。最伟大的考古学家的书也逃不过这样的命运。它们至多只是在专业人士中传阅罢了。然而，有些由非专业人士写的书倒是深受大众欢迎，这或许是写书的人与读书的人情感相通的缘故吧。那么，考古学家的情感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如果一个人开始不是被这门学科那激动人心或与众不同之处吸引而投身其中，那倒是不可想象的。基于这一点，我们是不是仍然可以对考古学家和考古学有所期待呢？

事实上，在今天，认识和方法的进步除了使考古学更加严格、更加精密或许在某些方面更加神秘之外，也空前地发展了它的可能性。今天我们可以凭借最先进的技术从一小片陶片上获取极端丰富的信息。如它的原料是什么，来自何方，在何种温度下烧成，制成的日期，并能够通过对极微少的沉淀物的分析来告诉我们它是用来盛什么的。考古学的兴趣也已由宫殿、王陵、珍宝室转向了村落、民居、矿坑甚至果园和菜园。它把神话传说中由神谕、英雄历险、战争和荣

誉组成的世界，还原为喜怒哀乐生离死别的普通人的世界，我们在这个世界中可以更多地发现自己的影子。

有人说，历史学只是考古学冰山露出一角，而考古学家告诉我们，对于古代文明的遗迹，我们的发现只是微乎其微。把现今的发掘所得和那些可信又可疑的历史文献——不论是文献还是文物都可以造伪——通通加起来，我们对于古代世界依然知之甚少。

那是我们的故乡，我们与它有着血缘联系，我们在它的遗迹上寄托自己，它则借我们重生，就像幽灵借人体复活一样；但它又是异乡，为巨大的时间所吞没，而我们已经失去了重要的信物，找不到归乡的路，因为记忆太短，历史太长，不可以重温。我们与它似曾相识，却又完全陌生，对于我们来说，它更像一个崭新的世界，需要去发现。

因此，到底是谁发现了文明呢？是考古学家，还是我们这些人，抑或是文明本身？

不管怎么说，考古学缩短了我们与这个既遥远又亲切的世界的距离，是我们手中寻找失落的故乡和发现新世界的信物，尽管这个信物的奥秘有时是掌握在行为怪癖的考古学家的大脑里的。

从19世纪后期开始，中国的边疆和腹地开始出现外国探险家和学者的身影。20世纪初年，随着西方探险家悄然进入西域的脚步，戈壁荒漠中的遗址、废墟遇到了蓝色眼睛好奇而狂热的注视，随之便经历了一场贪婪、不顾一切的掠夺。震惊和伤痛之余，一门新的称之为“田野工作”的研究方法也进入了传统的金石学和历史学的视野，其影响由新材料的发现、搜求和整理渐进至学理的探讨、方法的实践，由

金石学而古器物学而考古学。此后,游学海外的群体中更涌现了一批有志于此的学子,归国后致力于古文明的研究,由此诞生了中国自己的田野考古学。20年代,裴文在中周口店,李济、袁复礼在仰韶,董作宾在殷墟,为中国人自己进行考古发掘之始,并完成了从与外国学者合作到自己主持到独立进行科学发掘的历程。此后,夏鼐、吴金鼎、梁思永、黄文弼、向达、阎文儒等的艰苦工作,都揭示了中国史前文明及历代文化的面貌。

从那个时候起,粗粗算来,考古学在中国已有了100年的历史,较严格的说法,中国的现代考古学也已有了70年的里程。

1949年以后,考古发掘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期,重大发现接踵而至,每每引来关于中国文明起源、发展的热烈讨论,不仅对学界造成巨大影响,更在社会上引发了普遍的热情。那一时期,对于民族文化的自信、对于宏大理论的追求以及集体主义的精神,培养了一批考古学者和他们的经验方法。虽然那些成果像其它学术研究一样,几乎都被用于充实一个似乎牢不可破的论断而丧失了它的独立性,但终究是丰富了人们对古代文明的了解。

80年代以来,新发现之多甚至又超过了前几十年的总和。而禁锢冲破以后,考古学界也开始进行反思,对于思想的重视、对于国外理论和方法的接纳重又成为主流,学风为之一新。新材料、新论点一经提出,便引来一片争鸣,其结果往往振聋发聩,随即引发方法和理论的革新。许多重大问题重获讨论,历几十年不变的观点遭到质疑和挑战。这一系列转变之后,梳理中国考古学的历史,已成为学者的愿望,为前辈,为自己这一代,也为后人。

与此同时，经历了文化讨论热潮和新成长起来的一代培养了自己对于中国文明、文化的广泛兴趣，这种兴趣带着反思精神和独立认识的热情，与 90 年代末的考古学相遇了。

《谁发现了文明丛书》就是这一相遇的产物。

参与到这一丛书的策划和写作中来的人，有的是经历丰厚的考古学家，有的是年轻热情的考古工作者，研究领域不同，治学风格各异。他们期望他们的写作，不仅仅是关于事实的叙述，不仅仅是对于历史和荣光的追溯，更是一种思考，个性化的但是严肃的探究。他们所渴望传达的是一种考古学的世界观。

李济留下了一部《安阳》，夏鼐也曾写过《甘肃考古漫记》，那里面除了深厚的知识素养和学者的睿智，更有一种对于世界和思索的原初的激情。这是治学的基础，也是为更多的人写作的基础。我们希望，这一丛书至少是继承了这一传统的。

丛书编委会

